

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 S. Huntington 的參與理論

郭秋永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

在政治參與的研究領域上，政治學者的關注焦點，向來集中在歐、美先進國家，直到六十年代中葉以後，方才逐漸推展到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研究領域的嶄新推展，當然易於引起舊有概念、通則、模型、或理論是否適用的問題，從而激發出政治參與研究上的「舊意象」與「新意象」的轉換課題，並惹起一些有關方法論的研究爭議。在這些仁智之見中，歷來最受矚目而足以「自成一家之言」的論著，莫過於 Samuel P. Huntington 的一系列著作了。本文的主要目的，乃就「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分析 Samuel P. Huntington 的立論基礎，從而說明各種難以抉擇的參與模型，以期釐清某些困擾學界已久的基本爭端。本文的分析，將從「政治參與的意義轉折」、「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以及「階段性的參與模型」等三個重要層面，逐一分別進行。

關鍵詞：政治理論、民主理論、政治參與、政治學方法論

一、引言

近二、三百年來，一般公民的政治參與，一直都是歐、美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種現象。一些政治學者甚至指出，十九世紀末葉以降的歐洲政治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政治參與管道」的發展史 (Nie and Verba, 1975:31;

Verba, et al. 1978:2-5)。按照他們的見解，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化，實際上沿循兩種方式進行。其中一種方式乃是，「政治參與之權利項目」的逐漸增加，例如選舉權、請願權、訴願權、擔任公職權、及結社權等權利的逐一添增。另一種方式則是，分享「政治參與權利之人數」的逐漸增多，例如選舉權的歷史，便是漸漸取消經濟條件、教育程度、種族、及性別等限制，從而使得享有選舉權的人數，逐步提高，終至成為全體公民所共享的一個過程。

政治參與既是歐、美民主政治的重心，當代駢出迭陳而爭執不已的各種民主理論，大體上也就環繞著「公民參與角色」而打轉。一般而言，這些紛紜雜陳的爭論，基本上可以區分成為兩大類別的課題。其中一類重視「經驗性」的民主理論，著眼於公民實際參與的數量、模式、成因、及後果，例如抱持「價值中立原則」的著名政治科學家 R. Dahl 所建構的「多元政治」（參見郭秋永，1998b）。另外一類則著重「規範性」的民主理論，專注於應該賦予公民何種程度或數量的政治參與，才能孕育出理想的公民德行，例如否定「價值中立原則」的著名政治哲學家 B. Barber 所揭櫫的「強勢民主」（參見郭秋永，1999）。然而，不論「規範性」或是「經驗性」的理論課題，也不管抱持或否定「價值中立原則」，政治學者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歐、美先進國家。直到六十年代中葉以後，政治現代化或政治發展的探討，方才促使政治參與的經驗研究，漸由「已發展的」或「已開發的」歐、美先進國家，推展到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研究領域的嶄新推展，當然易於引起舊有概念、通則、模型、或理論是否適用的問題，從而激發出政治參與研究上的「舊意象」與「新意象」的轉換課題（參見 Nelson, 1987:103-5），並惹起一些有關方法論的研究的爭議。依據筆者的淺見，在這些仁智之見中，歷來最受矚目而足以「自成一家之言」的論著，莫過於 Samuel P. Huntington 的一系列著作了。

一向堅持「價值中立原則」的著名政治科學家 S. Huntington，在政治參與研究領域上的論著，雖然不如他在「文明衝突論」上所引起的廣泛回響和激烈論戰，但其中獨排眾議的新穎見識，確也撼動學、官兩界無數人的心弦。筆者深信，在解析「多元政治」與「強勢民主」後，對於政治參與的規範探討或經驗研究，筆者應該已具一定程度的知識背景，而有助於剖析 S.

Huntington 有關「發展中國家」政治參與的獨到見解，進而紓解其中一些極富挑戰性但不易克服的根本難題。本文的主要目的，乃就「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分析 S. Huntington 的立論基礎，從而說明各種難以抉擇的參與模型，以期釐清某些困擾學界已久的基本爭端。本文的分析，將從「政治參與的意義轉折」、「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以及「階段性的參與模型」等三個重要層面，逐一分別進行。

二、政治參與的意義轉折

在政治學方法論的教科書中，強調概念製作之重要性的言詞，例如「概念實為科學研究的重要基石」或「概念的界定與測量，確為科學研究的關鍵步驟」，乃是俯拾即是之常見說詞。然而，在實際進行的各類研究中，除了少數幾個例外，這種信誓旦旦的重視說詞，往往流於草草交代的口惠言辭（參見 Sartori, 1984; Kramer, 1986）。在這些少數例外之中，頗具啟發性而足以作為製作典範之一的，就是歷年來政治學者針對「政治參與」所進行的一系列的概念解析。

乍看之下，「政治參與」這一概念，似如 A. Birch (1993:80) 所說，乃是一個「能夠輕易例釋其意義」的概念，而非一個「本質上可爭議的概念」。然而，稍加察考當代研究文獻，我們不難發現，政治參與的界說，竟然形形色色而不易取捨。它有時既包含參與態度又包括參與行為，有時僅指參與行為；當只指參與行為時，有時單指政治專業者的參與行為，有時兼指一般公民的參與行為；當只指一般公民的參與行為時，有時包括公民直接參與決策和公民間接影響決策兩種行為，有時單指其中之一的參與行為，或者，有時只指政府領域內的參與行為，有時也涉及政府領域外的參與行為；當指一般公民影響政府領域內的參與行為時，它更依違於合法的和不法的、個體的和團體的、有效的和無效的、自發性的和操縱性的、以及規律性的和突發性的參與行為之間。難怪 H. Bienen (1974:8-9) 曾經嘆道，它已經淪為一個幾乎涵蓋所有政治現象的雜湊概念了。H. Bienen 的說法雖然稍嫌誇張，但各種研究文獻中「政治參與」的指涉範圍，確實橫斜圓直不盡相同。依據個人淺見，

在各式各樣的界定方式中，S. Huntington 的界說及其闡釋，扮演著關鍵性的轉折角色。

早在一九五二年，S. Huntington 就已十分注意政治參與的經驗研究，也曾運用十分廣泛的方式，界定政治參與的意義。在一項合作研究中，S. Huntington 等學者指出：「此處廣泛界定政治參與，而不自限於投票行為的狹窄意義……廣義而言，它包含競選活動、討論政治、接洽官員等活動。它不僅注意投票當天的行為，而且關注個體與政治系統之關係的基本向度……所謂的『關係』，不但包括投票、資助政黨、及致函國會議員等單獨行為，並且著重政治系統中各個個體透過政治活動性質而展現出來的角色和位置。政治參與的範圍，從外顯活動到純屬興趣（諸如接觸大眾媒體）。」（Huntington, et al. 1952:1015-6）從這個界說，我們可以清楚看出，S. Huntington 等學者的界定方式，突破以往侷限於投票行為的界說，而將行為研究的觸角，伸展到相當寬廣的領域，並促成嶄新的研究風潮。可是，S. Huntington 等學者雖然特別重視政治參與的「行為」，但也將接觸大眾媒體之類的「興趣」或「態度」包含在內。大體而言，這種廣泛的界定方式，未免失諸太寬。依據一般學者的意見，政治參與主要是一種「實際上的行為」，雖然關連著行為者本身的某種興趣、感覺、態度、或信念等心理傾向，例如政治興趣或政治功效感，但顯然有別於這些心理傾向。主觀上的心理傾向，也許就是促成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但是並非政治參與本身；除非政治行為者「有所行為」，否則不足以號稱「政治參與」。值得注意的，S. Huntington 等學者雖未分辨政治參與之自願與否的性質，但從其界說和例釋，可以輕易斷定他們所謂的政治參與，僅指「自主性」或「自願性」的參與行為。

除了要將心理傾向排除在外，M. Weiner (1971:161-4) 認為研究者於界定政治參與時，尚需注意幾個論點。第一，政治參與僅是一種「自願」行為。凡屬「非自願」的行為，例如納稅、義務兵役、以及遵奉政府命令出席或組織群眾大會等行為，均不得包含在內。第二，在「真正的」政治參與中，例如公職人員的競爭性選舉，一般公民實際上必須皆能「有所選擇」。這就是說，一般公民參加「僅有一名候選人」之類的活動，不是政治參與行為。M. Weiner 慎重指出，在專制政體中，此類「支持性的參與」（support participation）

或「強制性的動員」(coercive mobilization)，雖然具有一定的效用，但不可跟「真正的」政治參與，相互混淆在一起。第三，關於何種行為可以視作「政治的」參與行為，不同個體或社會，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基於這些論點，M. Weiner 本人在爬梳既有文獻中的十種界說後，遂將政治參與界定如下：「我們使用政治參與的概念，指涉任何運用合法或非法方式，企圖影響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之人事的自願行為。所謂人事，是指公共政策的抉擇、或公共事務的推行、或政治領導人物的選擇；而自願行為則包含成功的或失敗的，也包括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還涵蓋突發性的或持續性的自願行為。」(Weiner, 1971:164) 值得注意的是，M. Weiner 斷然把政治參與限定在「真正的」或「自願的」行為，而排斥其所謂的「非自願的」政治參與，或「支持性的」政治參與，或「強制性的動員」。依據他的見解，在一些專制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掌握實權的政治領袖，常能輕易動員民眾以期騷擾或破壞外國使館，也能動輒聚集成千上萬的民眾以便遊行示威或誓死效忠，從而令人以為，這些國家或地區中的政治參與數量，確實顯著遽增。然而，M. Weiner 指出，權力在握的政治領袖，通常不容許自願性的政治參與，也不培育一些可以影響政策的工會、農會、商會、及教師協會等專業團體，更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因此，所謂政治參與數量的遽增，大體上僅是形式的或無意義的(參見 Weiner, 1966:223-224)。

在比較或解釋各個國家的「政治參與數量」上，M. Weiner 所提出的這個界說，或可免除一些十分可能惹起的誤解，從而使得「政治參與」在特定假設或理論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然而，在政治參與的比較研究上，最常為人援用而甚具影響力的，卻非這個界說，而是另外一套的界說。此套極受矚目的界說，出自一個頗負盛名的研究團隊。這個研究團隊，在政治學家 S. Verba 和 N. Nie 的領導之下，大力推動「政治暨社會變遷跨國研究計劃」，而於六十年代中期起，針對美國、日本、荷蘭、印度、奧地利、奈及利亞、以及南斯拉夫等七個國家，分別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參與的調查研究。他們先後提出的政治參與的界說，約略計有三個。在這三個界說中，用來界定的文字，雖然互有出入，但所要傳達的意義，實質上未曾更動。我們試引其中一個界說如下：「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地以影響政府人事甄選或(及)政府活動為

其目標，從而採取的各種合法行動」(Nie and Verba, 1975:1; Verba, et al. 1978:1, 46)。在提出這類界說上，他們先後做過七個論點的進一步說明(參見郭秋永，1993:29-30)。其中較值得注意的，計有下述三個論點。首先，政治參與係指各種「以影響政府人事或決策為其目標」的行為，並不包含所謂的「儀式性的參與」、或「支持性的參與」、或「符號性的參與」。上文曾經指出，M. Weiner 把政治參與限定在「真正的」或「自願的」參與行為，而排除其所謂的「非自願的」或「支持性的」或「強制性的」或「動員性的」行為。如同 M. Weiner, S. Verba 等學者也主張，舉凡加入效忠當局的遊行、參加政府組成的青年團體、參與儀式性選舉中的投票、以及投入各種表示支持政府的經建活動等等，均非政治參與行為。顯然的，他們所要探究的，乃是「民主政治的參與」(democratic participation)，著重於那從群眾中湧現出來的一種影響力量，或是一種「自願的」行為。其次，不同於 M. Weiner, S. Verba 等學者認為，影響政府人事或決策的方式，實際上為數頗多，但他們所要研究的，僅限於「正規而合法的政治管道」，並不包含暴動、抗議、暗殺、叛亂、以及各種暴力行為。最後，政治參與乃是一種不易捉摸的概念。在特定社會中，原為法律所不容許的參與行為，或者，原為某種人士或階層所獨享的參與權利，可能隨著時代演進，而有劇烈的不同變動。進一步說，在甲社會中可以視作政治參與的行為，在乙社會中則可能被看作擾亂治安的行動。

值得注意的，對於自限在「自主性的」或「自發性的」或「自願性的」參與行為的界定方式，S. Huntington 基於四個主要理由而深深不以為然(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8-10)。第一，就個體的行為層次而言，自願與否或自主與否的性質，與其說是「全有或全無」，毋寧說是「或多或少」，因而難以斷然劃定一個「一分為二」的截點。即使勉強堅持一個單一分截點，依然可能留下許多無法歸類的事例，從而顯露出分截點的任意性。例如，在朝黨發起的遊行，就是動員性的(或強制性的，或操縱性的，或非自願性的)政治參與，而在野黨策動的遊行，便是自發性的(或自主性的，或自願性的)政治參與嗎？再如，前蘇聯公民可能由於忠黨愛國而參加「只有一名候選人」的選舉投票，這在自主或自願的性質上，就完全不同於美國公民出諸政黨認同的投票了嗎？S. Huntington 說：「總之，動員參與和自主參與，

不是涇渭分明的二分類別。說明白些，它們形成光譜式的連續體。在這種連續體上劃定任何一點以期區別動員參與和自主參與，必然皆屬隨便任意。正因區分是隨性的、界線是曖昧的，所以我們相信，這兩種參與都應納入研究設計中，而非畫出一條人爲分界線從而排除界線遠端上的所有資料與證據。」(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8)。

第二，就政治系統的層次而言，所有政治系統的政治參與，實際上都混合著自主性和動員性兩種參與；「程度之別而非有無之分」的性質，不但見諸個體行爲層次，並且形諸政治系統層次。在許多民主政治系統中，一般公民的政治參與雖能影響政府人事或決策，但其參與行爲未必完全出諸自願的或自主的；在一些威權的或極權的政治系統中，一般公民的政治參與，未必都屬非自願的或動員的。這就是說，不論在民主的或在非民主的政治系統中，公民的政治參與，皆是自願性和非自願性參與的一種混合。當然，組成此一混合的兩種成分比例，不但可以隨著不同的政治系統而有所差別，並且可在特定政治系統中隨著不同時期而有所差異。例如，民主政治系統中自主性參與的成分，遠高於威權政治系統；而威權政治系統中動員性參與的成分，則遠大於民主政治系統。再如，在某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時期的動員參與成分，遠多於經濟起飛時期；而經濟起飛時期的自主參與成分，則高於經濟落後時期。顯而易見的，若將政治參與侷限在自主性的參與，則無異於劃地自限，甚至隱含一個錯誤的假定，而誤以爲政治參與只是民主政治系統中特有的一種政治現象！

第三，自主性參與和動員性參與兩者之間，可能具有某種動態關係，而不宜遽然排除其中的動員性參與（或非自願性參與，或操縱性參與）。原爲動員性參與的行動，在歷經一段時間後，可能轉成自主性參與的行爲；反之，亦然。例如，在某些民主政治系統中（如美國），新近移民的投票行爲（如華裔美人的投票行爲），原先可能由於感激某種地方性組織（如中華商會）的幫助，而成爲一種動員性參與的投票行爲；久而久之，不論他們是否加入該地方性組織，其投票行爲十分可能轉成自主性參與的投票行爲；進一步說，全國性的政黨，不論是在朝黨或是在野黨，也可能成功地「滲透」並「掌握」該地方性組織，從而使其自主性參與行動，再度轉成動員性參與行動。同樣

的，在威權政治系統中，一般公民原先可能由於外在壓力的驅使，才去參加投票，但其投票行為往後可能逐漸轉化成爲公民職責的一種自願性表現，亦即可能轉化成爲一種表示支持政治系統及其領導人物的行動。顯然的，包含自主性和動員性兩種參與的研究，才能掌握兩者之間的動態關係，從而方能更加理解錯綜複雜的參與現象。

第四，自主性和動員性兩種參與，都對政治系統產生重大影響。不論是自主性參與或是動員性參與，這兩種參與行為皆對政治領袖，設定某種限制或提供某些機會，從而影響到政治系統的運行，因此理應一併探究，不宜捨棄其中之一。雖然自主性參與者和動員性參與者的「動機」不盡相同，但我們不應就此斷說，唯有自主性參與者介入政治，而動員性參與者則完全置身政治之外；這正如我們不能斷定，參加戰爭的人，唯有志願從軍的士兵，那些被徵召入伍的士兵，則全然袖手旁觀。S. Huntington 比喻說：「主張動員性參與者沒有參與政治，等於在說義務兵沒有參加戰爭……義務兵的動機，顯然不同於志願兵，而在某方面，兩者的行為也可能互有出入。可是，在戰場上，義務兵和志願兵的大部份活動，不但難以區別，並且同具類似結果。同樣的，在政治活動上，動員性參與者和自主性參與者的行為及其影響，亦復如是，儘管兩者的動機有別。」(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0)

顯而易見的，基於上述四個主要理由，S. Huntington 一定認爲政治參與界說的涵蓋範圍，至少必須廣泛得足以包含動員性參與在內。然而，如何界定，才能涵蓋適當的廣泛範圍，而不會重蹈一九五二年所提界說失諸太寬的覆轍呢？S. Huntington (1971:303-4) 指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一個有用的概念，不是具有「匯聚功能」(aggregating function)，就是含有「鑑別功能」(distinguishing function)。具有「匯聚功能」的概念，乃指一個涵蓋許多次級概念的概念；其各個次級概念確實分具該概念的特定性質，從而使得該概念及其諸次級概念的隸屬層次，足以構成一個「傘狀」的形狀。S. Huntington 特將這一種概念，稱爲「傘狀概念」(umbrella concept)。所謂一個具有「鑑別功能」的概念，是指一個有助於將某事物分離出兩個或兩個以上形式的概念；無此概念，該事物就無法區別。S. Huntington 就是依據「匯聚功能」和「鑑別功能」的有無，指稱「政治參與」乃是一個具有「匯聚

功能的傘狀概念」，並且重新界定如下：

所謂政治參與，我們意指一般公民用來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3,4; Huntington and Dominquez, 1975:10,33)。

依據 S. Huntington 的說明，上述界說雖然不包括一般公民的主觀態度、政治專業者的行動、以及非政治領域內的參與，但包含合法的和非法的、成功的和失敗的、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規律性的和突發性的、以及平和的和暴力的行動，尤其涵蓋著自主性的和動員性的參與。S. Huntington 指出：「我們所界定的政治參與，不但包含行動者本人用來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而且包括他人（並非行動者）用來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前者可以稱為自主性參與，後者則可稱為動員性參與……動員性參與者 (mobilized participants) 乃被誘導而去行動；關於其行動會給政府造成何種影響，他們不感興趣，甚至未必瞭解。他們依照指示而行事；這泰半或完全由於效忠、或愛戴、或尊敬、或害怕領導人，或者，由於相信領導人會給他們好處。」(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6-7; 125-6)

除了指明政治參與的涵蓋範圍之外，S. Huntington 再就政治參與的程度 (levels)、基礎 (bases)、及型式 (forms)，進一步說明上述界說。他指出，在解析參與的程度時，必須區別兩種次級向度 (sub-dimensions)：廣度 (scope) 和強度 (intensity)。前者乃指從事參與活動的人數比例，後者則指參與活動的規模、持續性、以及重要性。其次，研究者必須注意，除了少數個別性的參與行為之外，政治參與行為大都植基在某種團體基礎 (group bases) 之上，從而包含某種形式的合作活動，並謀求特定的團體利益。大體而言，常見的參與基礎，約略計有下述數種：階級、政黨、派系、里鄰、利益團體、主從關係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以及共同團體 (communal group，即在人種、宗教、語言、及種族等方面，具有類似性的人群)。進一步說，研究者雖可針對各色各樣的參與行為，依據其理論興趣進行各種分類；但晚近學者常用的型式或類型 (type)，計有投票、競選、遊說、組織、接洽、

以及暴力等六種活動型式。競選活動包含拉票、捐款、賄選、綁樁、張貼海報、發放傳單、擔任助選義工、以及參加造勢大會等影響選舉結果的各種活動。遊說活動包括靜坐、罷工、示威遊行、及集會抗議等活動。組織活動是指各種政治性組織的參與活動；這種組織可能致力於特定的個別利益，也可能專注於廣泛的公共議題，但皆以影響政府決策為其目標；身為此種組織的成員，不管是否積極介入各項的組織活動，加入組織這個事實本身，就已是一項參與行為——在某種意義上，組織本身代表消極或不活躍成員從事參與行為。接洽活動是指一般公民為了個人需求而接洽（或致函或賄賂）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的各項活動。競選、遊說、組織、及接洽等四種活動，包含合法和非法兩種形式；但合法與否，常隨不同國家而有所差別，即使在同一國家內，也每因不同時期而有所出入。暴力活動是以傷害人員或毀壞財物的方式，而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各種活動，包含暗殺、政變、叛亂、以及革命等。

由於政治參與可以分成上述六種型式或類型，所以我們勢需注意兩個進一步的重要論點。第一，某一型式之參與程度的增加，未必意謂另一型式之參與程度的提高。例如，不能單從甲社會投票率高過乙社會的事實，就逕行推斷甲社會內其他任一型式或所有型式的參與程度，也高於乙社會；同理，不能僅從甲社會投票率的明顯增多，便直接斷定甲社會內其他任何或所有型式的參與程度，也隨之提高。第二，按照 S. Huntington 的見解，我們雖可憑藉六種參與型式，分別條列各種測量項目，以資作為政治參與的「運作界說」（operational definition）（參見郭秋永，1993:39-41），但卻不能據以建構出一個衡量「整體參與」（total participation）的綜合指標（composite index）。S. Huntington 指出，只當每一參與型式之參與程度的增減，皆在反應相同因素，並對政治系統產生相似後果時，這一種綜合指標方才具有意義。然而，就政治參與的六種型式而言，每一參與型式之參與程度的增減，既非反應相同的因素，亦未對政治系統造成相似後果，因此即使可以測得它們各自的強度或廣度，也難以獲得一種能夠簡單加總在一起的「相對權數」，以期代表「整體參與」。例如，接洽活動的廣度，通常不同於競選、遊說、及組織等參與型式的廣度，既不反應社經發展的因素，又對政治系統造成顯然有別的后果，因而難將接洽、競選、遊說、及組織等活動所測得的各項數值，簡

單加總在一起而得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數值」，遑論加上暴力活動的數值了！據此而言，我們似乎只能個別地談及某一參與型式的程度，而不能加總地述及「整體參與」的程度了。S. Huntington 鄭重指出：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不同參與模式的原因和後果，那麼不能認為參與是一種單純的、同質的變項。「政治參與」是一個傘狀概念，是一整組變項的總稱；每一變項皆能適合它的核心界說，但每一變項或多或少各具不同的因果，並跟社經趨勢呈現出不盡相同的關係。只在最籠統的意義上，我們才能說及某一社會中政治參與程度的整體增加，才能斷定甲國的參與程度高過乙國。然而，去領會政治參與的大致變遷和對照，依然是可能的，並且我們有時將要談到整體參與程度的變化。(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4-5)

至此為止，我們應可掌握當代研究文獻中政治參與的意義轉折了。早在五十年代，S. Huntington 等學者就已運用十分廣泛的方式，界定政治參與的意義，而首開此一領域上的實證研究風氣。可是，這個既包含「態度」又包括「行為」的界說，終因指涉過廣，而失諸太寬。七十年代以後，政治學者最常援用的政治參與的界說，不但限定在「行為」層面上，而且明白分辨「自主性」（或「自願性」）和「動員性」（或「支持性」或「操縱性」或「符號性」或「儀式性」）兩種參與行為，並將政治參與的意義，限於前一種參與行為。七十年代中期的 S. Huntington，雖然同意政治參與是一種「實際上的行為」，而不包含任何態度或心理傾向，但卻基於四大理由，矢志凸顯一般學者侷限於「自主性參與」的不足為訓，從而力主研究者要將「動員性參與」包括在內。依據個人淺見，在政治參與的這種意義轉折中，S. Huntington 所憑藉的理由和所提出的定義說明，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下文試就三個關鍵論點，披露其中蘊含的深遠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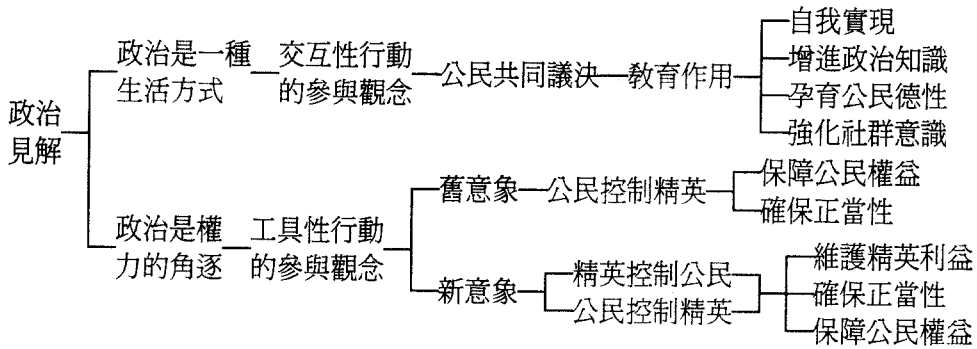
首先，試就西方政治理論史上參與觀念的演化趨勢，鋪陳 S. Huntington 所提論據的重要意義。大體而言，在西方政治理論史上，「政治參與」歷來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基本觀念。這兩種不同的基本觀念，分別對應著兩個互

異的「政治見解」(views of politics) (參見 Scaff, 1975; Barber, 1984)。第一個「政治見解」,乃將「政治」設想為一種生活方式,亦即認為「政治」乃是「人們力圖互惠地生活在一起的方式」。這樣的「政治見解」,要求公民時常聚集一起,設定一些可供探討的議題,從而各抒己見、相互討論、共同決策,期能解決彼此間的可能衝突,並希望能將私利轉化為公善。換言之,為了促成公善,各個公民應該平等參與決策過程,互信互賴以進行公開溝通,從而作成公平分配資源的各種決策,並付諸實行。依據這個「政治見解」,各個公民在共同的討論、決策、及行動等的參與過程中,不但能夠增進政治知識、孕育公民德行、及「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且能夠培養並強化社群意識或社群認同感。簡言之,在西方政治理論史上,第一個「政治見解」蘊含著「交互性行動」的參與觀念 (participation as interaction),而著重於「相互之間」的教育作用。第二個「政治見解」,乃將「政治」設想為稀有資源 (亦即權力) 的競取力爭,而「政治過程」就是權力的形成、分配、及執行。在此一見解之下,政治參與乃是影響或控制權力分配的一種政治行動。透過這種行動,尤其是競爭性的定期選舉,一般公民一方面可從相互競爭的少數政治精英中作一選擇,從而賦與統治權力,使其擁有施政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可表達其需求或支持,進而促成選任公職的輪替,使得政治精英不敢忽視其需求,並確保政治精英的回應。換句話說,政治參與具有保障公民本身的權利、儘量擴大公民自己的利益、以及提供政治系統的正當性等功能。簡單說,在西方政治理論史上,第二個「政治見解」涵蓋著「工具性行動」的參與觀念 (participation as instrumental action),而著重於「由下而上」的影響或控制作用。依據筆者的淺見,在當代既有的經驗性和規範性兩種研究文獻中,政治參與的界說及其闡釋,雖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規範性研究主要上乃在反映「交互性行動」的參與觀念,而經驗性研究則在反映「工具性行動」的參與觀念。誠然,不論「交互性行動」或是「工具性行動」,政治參與的基本觀念,向來密切關連著「民主政治」的概念。換而言之,不論規範性研究或是經驗性研究,政治學者泰半皆在民主政治系統中描述或解釋參與行為。有意無意間,在政治學者的心目中,非民主政治系統中的一些影響政府人事或決策的行動,就非「參與行為」了,至少不是「真正的」參與行為。

誠如 S. Huntington 所說，這是劃地自限的錯誤假定。基於上述四大理由，S. Huntington 認為政治參與的任何經驗性研究，不應逕對政治參與的性質，做出這樣的「先驗假定」；政治參與本是「任何類別的政治系統」中一般公民影響政府人事或決策的行為。S. Huntington (1968:34-5) 說：「擴大一般公民的參與行為，在民主國家中，可以提高人民對政府的控制，在極權國家中，則可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控制。」據此而言，政治參與界說中的「影響」語詞，除了「改變性」的影響意思之外，還有「強化」或「支持」的影響意思。這就是說，基於 S. Huntington 的論據，所謂的「影響」，已從「由下而上」的單向意義，轉成「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雙向意義了！S. Huntington 的這種主張，或許正是扭轉 J. Nelson 所謂之「研究意象」(research image) 的主要因素。依照 J. Nelson (1987:103-5) 的說法，晚近的參與研究，已由「舊意象」轉成「新意象」；亦即已從「參與交織著民主、參與屬於好的或善的概念、非民主系統中的參與概屬虛假」的意象，轉成「參與在邏輯上有別於民主、參與是中立性的概念、參與概念之內涵和外延的擴增」的意象。據此而言，新、舊兩個意象就分別對應著不同的「影響」或「控制」作用。舊意象契合「公民控制精英」的作用；新意象則包含「公民控制精英」和「精英控制公民」兩種作用。顯而易見的，在意象轉換的過程中，S. Huntington 的主張，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既可使得研究者能夠排除知識上固有的障礙，又可擴展整個研究領域到民主政治系統之外。值得注意的，就從事比較研究的政治學者而言，此一主張，在世界上多數人尚生活於「非民主系統」的事實之下，更加顯得意義非凡。總之，我們可將西方政治理論史上參與觀念的整個演化趨勢，繪成下述簡表，藉以進一步彰顯 S. Huntington 這一主張的深遠意義。

其次，在建立政治參與的綜合指標上，S. Huntington 的異議，十分值得進一步的推敲探究。依據 S. Huntington 的見解，政治參與乃是一個具有匯聚功能的「傘狀概念」，也就是說投票活動、競選活動、遊說活動、組織活動、接洽活動、及暴力活動等六個參與型式，雖然彼此有別，但是仍然同屬政治參與的次級概念，而同具政治參與概念的特定性質，進而使得政治參與概念及這六個次級概念的層級關係，足以構成一個「傘狀」。這六個參與型式或次

表一：政治參與觀念的演化趨勢



級概念，既然「同具政治參與概念的特定性質」，而隸屬於同一概念之下，那麼理應能夠依據共享的「特定性質」，建立一個有意義的綜合指標。可是，S. Huntington 卻持否定的觀點。他指出，這六個參與型式「雖然皆被用來影響某一層次的政府，但它們並非彼此都有關連，也非全以相同方向而變動，又非均在反應相同壓力……我們不能將政治參與的各個型式，有意義地加總在一起，所以極難判斷一社會中政治參與的整個程度。」(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45, 159) 在邏輯上，S. Huntington 的這個見解，顯然陷入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中：他一方面認為此六個參與型式「同具特定性質」，而足以共同隸屬於「政治參與」這個總稱之下，因而大可論及某一國家的「整體參與」，另一方面卻斷定研究者不能將六個參與型式各自測得的數值，加總成爲一個代表「整體參與」的綜合指標，因而只許個別討論某一參與型式的程度，至多「在最籠統的意義」上才能泛談整體參與程度的變化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4-5)。值得注意的，在實際上，S. Huntington 常在政治參與的相關著作中，綜論各個國家內參與程度之總體數量的多寡、增減、及變化，尤其解析「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時，更是分就目標、手段、及副產品等方面，提出自成一家之言的著名論點，完全「甚易」(而非「極難」) 論斷一社會中政治參與的整個程度！這種左右爲難而又前後不一的困境，確實亟待解決。依據筆者的淺見，六個參與型式的數值變化，是否源自相似的原因、是否呈現出相同的變化、是否促成相近的結果，誠屬建立綜合指標的考慮基準，但「同具特定性質」也是一個值得斟酌的標準。S. Verba 等學者

曾經根據影響類別、後果範圍、衝突強弱、主動程度、及合作層次等五個「特定性質」的各種合成狀況，而將政治參與區分成四個參與型式，從而在調查得到的各項數值資料上，進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藉以印證理論上的區別是否對應經驗資料上的區分，並運用「因子分數」(factor scores) 建構出一個代表「整體參與」的綜合指標(參見 Verba, et al. 1971:11-5; Verba and Nie, 1972:47-51; Nie and Verba, 1975:7-9; Verba, et al., 1978: 310-2)。筆者相信，為了解決 S. Huntington 的困境，S. Verba 等學者建構綜合指標的方式，確實頗為值得仿效。當然，在界定並闡釋政治參與的界說上，S. Huntington 之界說的指涉範圍，遠比 S. Verba 等學者的界說，更為廣泛寬闊，甚至還包括暗殺、政變、叛亂、以及革命等暴力活動，因此要在 S. Huntington 的界說中，如法炮製地推出一些可資建構參與型式和綜合指標的「特定性質」，實非輕易之事。筆者認為下述權宜辦法，也許不失為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法：暫時先將暴力參與型式另作處理、或者先行區分「慣常性」和「非慣常性」兩類參與行為、或者先行區別「合法性」和「非法性」兩類參與行為(參見 Conway, 1991:3-5)，然後再依 S. Verba 等學者的建構方式，進行參與型式的印證和綜合指標的建立。

最後，在自主性參與和動員性參與的分辨上，S. Huntington 的解析，雖然振振有詞，但也引出政治研究領域中一個尚待努力的基本課題。依照 S. Huntington 的說明，政治參與行為的自主(或自願)性質，本質上呈現出或多或少的程度差別，而非全有全無的類別差異，因此斷然「一分為二」的任何分截點，都難排除隨心任意的成分，從而不能客觀區別自主性參與和動員性參與。參與行為的自主性質，既是光譜式的程度之別，則個體層次和系統層次上的任何參與行為，便都同時具有自主性和動員性，或都混和著自主性和動員性，只不過組成這種混和的成分比例，並非一成不變罷了。一般而言，政治研究領域上具有光譜式或連續體式之性質的重要概念，雖非俯拾即是，但也是所在多有。這類概念的特定性質，通常是由淡而濃或由弱而強或由寡而多，逐漸呈現出順序性的遞增排列，因而左右兩端的事例，較清楚易辨，中間段落的事例，則較模糊難斷。就光譜式的自主性質而言，加入共產黨發起的群眾運動之類的參與行為(參見 Lapalombara, 1978:177-8)，可能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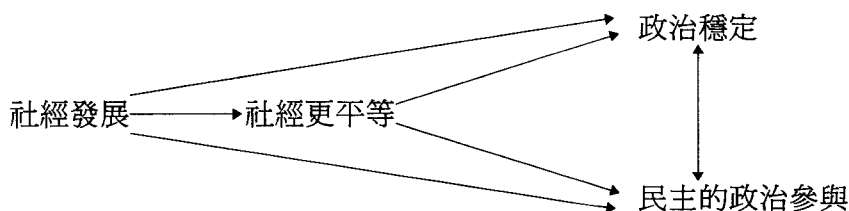
最少自主性（或最多動員性）而位於左端的事例，爲了個人需求而接洽地方政治人物之類的參與行爲，可能就是最具自主性（或最乏動員性）而位於右端的事例，至於大部份的參與事例，則介於左、右兩端（最少與最多自主性，或最多與最少動員性）之間，而混和著或多或少的自主性（或動員性）。然而，筆者必須指出，絕大部份政治參與行爲之自主與否的性質，雖然誠如 S. Huntington 所說，不易截然劃分，但是即使 S. Huntington 本人，也在上述所舉四個反對「一分爲二」的主要理由中，依然使用這樣的二分法而高談「自主性參與」和「動員性參與」，甚至在其他相關著作中，竟然暢論「民主系統的參與，乃是自主性參與，極權系統的參與，即是動員性參與，威權系統則無參與」（Huntington, 1989:16）！據此而言，這引出政治學界中一個亟待加強的基本課題：我們對於區分光譜式性質（例如自主性）的理解能力，遠落後於我們對於該區分的建構能力。換句話說，我們雖能理解「自主性參與」和「動員性參與」的差別，從而分別談及並探究這兩種參與行爲（參見郭秋永, 1985; Kim, 1980），但我們對於所做的區別，如同 S. Huntington 一樣，仍感不足而有所挑剔、有所批判。平實而言，這種批判本身，正在預設我們對於該區分業已約略理解，尙待加強的，乃是我們建構該區分的能力！筆者相信，這樣的一個見解，適用於多數具有光譜式性質的政治概念。

三、發展性的自由模型

大體而言，「政治參與」雖是一個不包含主觀態度的行爲概念，但卻帶有強烈的規範含意。一般人非但不會認爲政治參與是一種不值掛齒的不當行爲，反而相信它是民主政治系統能夠成功運行的一個關鍵因素。著名政治學家 R. Dahl (1971:5) 曾經指出，本世紀中最顯著的一個變遷，乃是有關政治參與行爲的評價，漸從片面性的否定之論轉成全面性的標榜之詞，即使最獨裁的統治者，依然不忘經常施加口惠式的頌揚。

按照 S. Huntington 的觀察，在當今世界各國中，最珍視政治參與的國家，莫過於美國。他指出，美國人大都相信，介入政治事務乃是理所當然的應爲之事；因爲既能促成負責任的民主政府，又可孕育出富有道德感的良好

公民。美國人的這種信念，不但顯現在公職人員的選舉數目與選舉次數上，而且表現在各種結社的數目與活動中。換句話說，美國人深信，「政治參與的擴展，乃是美國社會和其他社會的一個可欲的目標 (a desirable goal)」(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8)。一旦美國社會本身未能充分實現這個可欲的社會目標，則其社會成員便感不妥，從而認為應該努力改善。同樣的，當美國想要援助其他國家時，美國公民便會認為美國國會應該明文規定，被援助國家之政治參與的擴展，乃是取得美國經濟援助的先決條件；一旦被援助國漠視此一可欲的社會目標，則應中止美援。尤須注意的，S. Huntington 指出，美國人民珍視政治參與的信念，透過無數的學術著作，或顯或隱地反映在下述的「發展性的自由模型」(liberal model of development)：



圖一：發展性的自由模型

(摘自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9)

在政治學方法論上，「模型」有別於「理論」(Isaak, 1985:163-81)，但 S. Huntington 不加分別而交替使用，因此上圖的「發展性的自由模型」，有時又稱為「發展性的自由理論」(liber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Huntington, 1987:15)。S. Huntington 雖然曾說「理論」指謂「若干概念變項之間的關係……一般是以『無時限真理』(timeless truth) 的形式而提出」，十分不同於「解釋」(explanation) (Huntington, 1991:xiii-xiv)，但從未正式說明「模型」的意義，至多只說「每一模型皆是一個抽象」，從而具有下述五項作用：1, 針對真實進行安排並加以通則化；2, 理解現象間的因果關係；3, 預期並預測 (若幸運的話) 未來發展；4, 區別重要與否；5, 展示某些達成目標的途徑 (Huntington, 1996a:30)。從這五項作用看來，我們或許可說，S. Huntington

所謂的「模型」，似指「提示諸概念間尚未證實的各種關係」。在這樣的理解之下，下文試就圖一中的各項關係，擇其要旨分別加以檢視。

按照圖一所示，在特定的國家中，當社會和經濟都到達一定的發展程度後，既可逕行促成政治穩定，又可直接提高民主的政治參與，更可自行實現較為平等的社經分配；社會和經濟分配更加平等之後，也可直接導致政治穩定，還可逕自促進民主的政治參與；政治穩定和民主的政治參與之間，則交互增強而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誠然，在圖一的這些關係中，最令人矚目而引起廣泛討論的，莫過於社經發展促成民主政治參與的因果流向，也就是 S. Huntington 所謂的「發展假設」(development hypothesis)：高度的社經發展導致高度的政治參與，從而促使動員性參與轉成自主性參與。那麼，這個「發展假設」能夠成立嗎？經得起實際資料的考驗嗎？

按照 S. Huntington 的術語，社經發展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泛指都市化、工業化、農業商品化、傳播媒體的發展、職業結構的分化、以及一般包含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 兩種概念中的相關過程，也就是泛指整個「發展」或「現代化」過程中的部份過程 (Huntington and Dominiquez, 1975:4;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 17; Huntington, 1996a:68; 1996b:29)。那麼，社經發展為何能夠促進政治參與呢？S. Huntington 認為一般學者提出「發展假設」的理由，約略計有五個。第一，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程度，通常隨著社會上「社經地位」的變化而變動。這就是說，在一個國家中，具有較高的所得、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等的公民，往往具有較強的「政治功效感」、較高的「政治興趣」、及較多的「政治知識」等主觀態度，從而較常從事政治參與行為，而較低的所得、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等的公民，則較少具有此類的主觀態度，因而較少參與政治生活；就整個國家來說，當社經發展提高社會中「較高社經地位者」的人數時，自然而然地也就提高了政治參與的人數。第二，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程度，時常隨著社會組織或團體的湧現而提高。就個體層次而言，組織成員通常遠比非組織成員，更易介入政治，而社經發展使得較高的所得、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等的公民，更傾向於介入組織；就國家層次來說，社經發展促成組織類別的繁化蔓分，例如工會、商會、農會、文化組織、社區組織、娛樂

組織、及宗教組織等的大量出現，從而吸引更多公民加入各種組織，並強化或創造「團體意識」，以提高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簡單說，一個國家的社經發展，不但增加各色各樣的組織，而且吸引更多公民介入各種組織，因而提高了政治參與的程度。第三，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程度，時常隨著社會團體間的衝突或緊張而提高。一般而言，國家的社經發展，可能引起社會團體間的緊張或衝突，甚至可能產生一些威脅到舊團體的新團體，從而各自強化「團體意識」，終而訴諸政治行動，期能維護本身的利益。例如，在國家的社經發展過程中，一些都市的郊區，可能出現「土地擅佔團體」。這些擅佔者通常採取集體行動佔用公地或私地，進而強化本身的「團體意識」，終而訴諸各種政治行動，期能對抗地主、警察、或市政單位，並望長期保有佔住區，甚至獲得水電供應之類的市政服務。簡言之，一個國家的社經發展，可能增加新、舊社會團體間訴諸政治行動以維護權益的可能性，從而提高了政治參與的程度。第四，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程度，往往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充而提高。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社經愈發展，愈可能擴大政府的活動範圍，從而愈可能影響到一般公民和社會團體；一般公民和社會團體愈加體認政府的相干性或重要性，則愈可能積極介入政治，整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程度，也就隨之提高。第五，一個國家的社經發展，孕育「公民」概念，從而提高政治參與的程度。這即是說，社經發展通常沿著國家層次而推進，因而促使各個個體超越地方性、階級性、或宗教性等的區隔，進而認同或效忠國家。這樣的國家認同感，往往展現在「所有公民都具有政治參與的平等權利或責任」的公民概念上，而使得各種型式的參與行為，獲得「正當性」，進而提高各種型式的政治參與程度。

大體而言，這個「發展假設」雖曾得到或強或弱的經驗支持（參見 Huntington and Dominquez, 1975:33-8;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 19），但不是一個普遍成立的有效命題。一些實證資料分別呈現出下述幾個情況。第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經發展，通常隨著時間而穩定上升，但其政治參與程度未必隨著時間而緩慢提高，即使隨著時間而變動，依然未必對應著社經發展的變化。例如，在一些共產國家中，社經發展程度雖低，但投票率早已甚高；其高度的投票率，當然不可能隨著時間的演進，而一再持續提

高上去。再如，在法國、日本、土耳其、菲律賓、以及巴基斯坦等國家，較低社經發展的農村地區的投票率，遠高過較高社經發展的都會區域。第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參與程度，往往變化緩慢，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常有短期內忽高忽低的劇烈變化，尤其是戰爭前後或獨立前後的時期，更有急遽的變動情況。例如，二次戰後的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投票率，以及獨立後的肯亞、烏干達、及一些非洲國家的許多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都有突然滑落的情況。第三，一個國家或地區各種政治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未必「全然一致」地隨著社經發展而提高；有些增加，有些則減少，各種參與型式各有不同的多寡變化。例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原有高度的投票率和低度的其他政治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當社經進一步發展時，投票率便告下降，而其他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反而提高。再如，肯亞在獨立前的政治參與，大都集中在選舉活動，獨立後則著重於遊說活動，十足展現出不同參與型式各有不同變化的情況。總之，在一些情況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參與程度的變化，以及不同政治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的變動，確實獨立在其社經發展之外。

那麼，在上述一些情況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參與程度，為何沒有隨著社經發展而變化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上計有兩個主要理由。第一，一些受到社經發展的影響、從而左右政治參與的因素，除了社經發展之外，有時可能也會受到其他變項的影響。例如，團體衝突、團體意識、組織介入、以及政府職能的擴大等左右政治參與的這些因素，雖然受到社經發展的影響，但可能也會受到戰爭、移民、宗教、以及意識型態等其他變項的影響，因而能夠獨立在社經發展之外而左右政治參與。當這些有別於社經發展的其他變項發生顯著的影響作用時，就使得政治參與的變化，顯得無關於社經發展了。第二，社經發展中的某些過程，雖對政治參與具有正面的作用，但可能也會具有負面的作用。例如，政府職能的擴大，便對政治參與具有正、反兩面的不同作用。就反面作用而言，當政府職能擴大時，政府決策便逐漸專業化、複雜化、技術化、及普及化，因而可能拉大政府官員與一般公民之間的「社會距離」，並降低一般公民的「政治功效感」，從而減少遊說活動和接洽活動的參與程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社經發展

使得決策數量快速集中在國家層次時，大部份公民的參與對象，在短期時間內，仍會停留在那日漸減少數量的地方性決策上，因而可能降低某些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再如，社經發展所促成的各種關係或組織的「功能專化」，也可能降低政治參與的程度。在社經尚未發展的國家中，精英和群眾大都透過經濟、社會、宗教、及政治等多重關係而連繫在一起。這種「多重功能」的關係，使得地主、仕紳、或村長等精英，易於運用社會威望、經濟誘因、文化優越、及或隱或顯的脅迫，動員群眾介入政治。當社經發展促成各種關係或組織的「功能專化」後，這種原有的動員力量，便告減小，從而降低了政治參與的程度。又如，社經發展提高各個個體的「社會流動」的機會，而在短期上也可能降低政治參與的程度。一般而言，社經發展增強了道路的聯絡系統、提高了傳播媒體的數量、及增加了城市的工作機會等，從而降低了農民移居城市或轉業的代價和不確定性，也大幅減少農民不得不訴諸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綜合上述，我們或可斷定，就長期而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參與程度，確實隨著其社經發展程度而變化，即使經驗研究至今依然不能證實特定的因果流向，也不能否定國別差異。換而言之，我們或可斷定，在其他條件均相同之下，這兩者確實相伴相隨、一起變動，但因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其他條件」實際上不盡相同，因而使得兩者之間固有的相關，顯現出更強或更弱或無關的改變。顯而易見的，能夠掌握這些不盡相同的「其他條件」，乃是能否更進一步推展政治參與研究的關鍵所在。依據 S. Huntington 的見解，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這些不盡相同的「其他條件」中，最重要的條件莫過於「政治精英對於政治參與的態度」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社會的團體意識與凝聚力的程度」。總之，關於「發展假設」，我們可以接受 S. Huntington 的基本論點：「發展假設需從兩個方面加以修正。一般而言，『發展』和『參與』確實攜手並進。然而，在某些情況中，尤其當一個社會捲入一場規模龐大、創傷慘重的戰爭中，某些政治參與程度可能在缺乏相應的社經發展之下顯著提高；在另外一些情況中，例如在傳統團體意識和凝聚力均屬薄弱的社會，某些社經發展也能在缺少政治參與之下推展開來，而前者對後者的正、反作用，則不易確定。」(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53)

事實上，所謂的「發展假設」，除了明白設定社經發展和政治參與之間的因果關係外，它還隱含設定一個命題：社經發展促使「動員性參與」轉成「自主性參與」。不過，依據筆者的淺見，誠如本文前一節所指出，政治學者雖能約略區分「動員性參與」和「自主性參與」，但目前尚乏建構這種區分的能力，因此有關「動員性參與」轉成「自主性參與」的經驗研究，一向付諸闕如，從而難以判斷「發展假設」中這個隱含設定的命題的效力。或許，我們可從這個隱含設定，推出幾個可供進一步探究的想法。第一，當一個國家的社經尚未發展時，甚少政治參與行為，不論是「動員性參與」還是「自主性參與」，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層級之外；一旦社經開始發展時，「動員性參與」首先擴充，「自主性參與」隨後逐漸擴展。這或可說明社經較不發展地區中的高投票率、以及其投票行為和公民態度之間呈現出無顯著關係的緣故。第二，一個國家的「動員性參與」，跟其社經發展呈現出倒 U 形狀的關係，而「自主性參與」則跟其社經發展呈現出線型關係。第三，在社經較發展的城市區域中，「動員性參與」的式微，反映在投票率的下降，而「自主性參與」的上升，則反映在其他政治參與型式的參與程度上（參見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54）。然而，不論經驗證據的強弱或有無，關於整個「發展假設」，S. Huntington 所下的結論是：

在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展上、在促成參與基礎的多樣化上、以及在促使自主性參與取代動員性參與上，社經發展確實具有長期性的效果。自由模型中所設定的這些關係的效力，乃是成立的，雖然發展對參與的影響，未必是立即的、直接的、或完全的。（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64）

除了「發展假設」之外，在「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中，尚有一個重要的設定，它就是 S. Huntington 所謂的「平等假設」（equality hypothesis）：社會經濟的更平等，導致民主的政治參與；或者，社會經濟的更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參與之間存在一個因果關係。然而，由於平等概念的難以測量，以及因果關係的不易確定，有關「平等假設」的經驗檢定，歷來就少如鳳毛麟角。

S. Huntington 雖曾查考一、二個類似研究，並提示兩種可能的檢定方式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65-70)，但尚稱不上「平等假設」的實際檢定。誠然，圖一之中還有幾個尚待檢定的因果流向，例如社經發展導致社經更平等、從而產生民主的政治參與、進而促成政治穩定，或社經發展導致政治穩定、從而促成民主的政治參與，或社經更平等導致政治穩定、從而促成民主的政治參與……。對於這些因果流向的設定，S. Huntington 大都存而不論。

總而言之，關於圖一所設定的各種因果流向，S. Huntington 事實上只對其中的「發展假設」，進行較為深入的檢視，其餘的各種設定，不是存而不論，就是數語帶過。儘管如此，S. Huntington 仍對整個「發展性的自由模型」，臚列出下述幾項缺失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20-1)：

一，方法論上的弱點：

- (一)各個因果關係的假定，大都推自最發展國家與最不發展國家間總體資料的靜態比較。
- (二)忽視變遷過程對於穩定、平等、及參與的影響。
- (三)僅從相關資料就跳到因果關係。
- (四)端賴一個「新馬克斯主義」的前提：單從經濟導致政治的因果流向，而非相反的因果流向。

二，經驗證據上的質疑：

- (一)「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暴亂與不穩定，實際上遠高於低度發展國家。
- (二)「發展中國家」的所得分配，遠比高度或低度發展國家更為不平等。
- (三)高度經濟成長通常伴隨著日益不均的所得分配。
- (四)大量研究都在懷疑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連。

三，歷史上的不相干：僅有美國近似「發展性的自由模型」。

四、階段性的參與模型

不論 S. Huntington 對於「發展性的自由模型」的批評，是否鞭辟入裏，就七十年代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卻能顯現出非比尋常的深遠意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亞、非、及拉丁美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社經發展或多或少乃是一件事實：快速的都市化、漸增的識字率、緩增的生產量、漸進的工業化、漸密的大眾傳播網、及激增的政治參與等，似乎都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可是，政治穩定、國家整合、及民主政治等一向企求的政治目標，卻猶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若依美國學、官兩界所深信的「發展性的自由模型」，社經一旦更加發展，則政治穩定或民主政治，理應伴隨而至了。然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僅有一再重現的政變與叛亂，而無政治穩定；僅有一再重複的內戰與種族衝突，而無國家整合；僅有一再輪替的軍人干政與一黨政權，而無民主政治；僅有日見低落的行政效率，而無理性的行政革新。那麼，除了「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之外，是否另有參與模型？從一向自詡為社會「科學家」的 S. Huntington 看來，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誠然，在檢視各種參與模型之先，勢需掌握政治參與和政治不穩定之間的密切關係。自 S. Huntington 看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動盪不安，主要肇因於社會的快速變遷、政治參與的遽增、以及緩不濟急的政治制度等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些因素之間的一系列關係，可用下述三個簡單式子，加以陳述 (Huntington, 1968:55; 1971:314)：

- (1) 社會動員 / 經濟發展 = 社會挫折
- (2) 社會挫折 / 流動機會 = 政治參與
- (3) 政治參與 / 政治制度化 = 政治不穩定

式(1)中的「社會動員」，是指一個社會中都市化、識字率、教育程度、及接觸大眾傳播等的提高，使得人們可以脫離舊式之社會的、經濟的、及心理的束縛，而接受新的社會化模式與行爲；「經濟發展」指涉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和生產力的成長；「社會挫折」乃指提高社會滿足新期望的能力，趕不

上新期望本身的增長速度，從而在社會需求與滿足需求之間釀成一大差距，終而萌生不滿情緒。簡單說，「社會動員」提高社會成員的新期望，「經濟發展」增加社會滿足新期望的能力，「社會挫折」是一種不滿的社會情緒。因此，式(1)表示，當社會動員的速度愈快、經濟發展的速度愈慢時，社會挫折便愈大。反之，當社會動員的速度愈慢、經濟發展的速度愈快時，社會挫折便愈小。式(2)中的「流動機會」，是指水平與垂直兩種流動的機會；水平流動乃指，個體的地位可從一個社群或團體改隸成另一個社群或團體；垂流流動則指，個體的地位可從低階層升到高階層，或從高階層降到低階層。一般而言，當社會中的社經結構，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而能提供足夠的水平流動與垂流流動時，「社會挫折」便可透過「流動機會」而被排解。因此，式(2)是說，一旦產生社會挫折，當社會少有流動機會時，人們可能被迫採取政治參與行為，以期維護本身權益；流動機會愈小，訴諸參與行為的可能性愈大。當社會充滿流動機會時，一般人大都透過社會上或經濟上的努力，以期滿足本身的期望，而不太會採取政治參與行為；流動機會愈大，訴諸參與行為的可能性愈小。式(3)中的「制度化」，乃指組織或程序獲得價值與穩定性的過程。「制度化」的層次愈高，組織或程序就愈能適應環境與時間的考驗、愈含有多樣的組織目標與次級單位、愈具有自立性而不受其他組織或程序的恣意影響、愈能調節並緩和新老勢力的衝擊以及愈具有凝聚力。因此，式(3)表示，當社會成員訴諸政治參與行為時，假使政治制度處於低層次的制度化階段，而缺乏正規管道以資疏導或匯整，那麼將會導致政治不穩定；政治參與程度愈大，政治制度化愈低，政治愈不穩定；反之亦然。就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說，社會既少流動機會，政治又乏制度化，但社會動員的速度卻遠快於經濟發展，因而急遽增加的政治參與程度，就很容易造成政治不穩定。

諸「發展中國家」雖然致力追求政治發展，但舉目所見，卻是一團紛亂、一片衰敗。顯而易見的，如何重建公共秩序，乃是「發展中國家」刻不容緩的迫切課題。S. Huntington (1968:7-8) 指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能無秩序而有自由。在權威能被限制之前，權威必先存在；於那些現代化中國家內，權威的蹤跡，難得一見，滿目所見的，卻是政府聽任疏離的知識份子、桀驁不馴的軍官、及騷亂的學生等的恣意擺佈。」事實上，在 S.

Huntington 看來，「秩序」不但是「發展中國家」首應追求的重要價值，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不得漠視的基本要務。S. Huntington (1968:1) 指出：「世界各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別，不在於政府形式 (form of government)，而在於統治程度 (degree of government)。」例如，美國、英國、及前蘇聯等三個國家，雖然具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共同具有高度的「統治程度」。在這三個國家中，人民皆對政治系統的正當性，共享高度的共識；公民與領袖也對公共利益與建國原則，分享相同的見解。尤須注意的，這三個國家都擁有高度適應力與凝聚力的政治制度，亦即它們都具有效能的行政系統、組織良好的政黨、政府介入的經濟活動、以文領武的軍事系統、以及控制政治衝突與調節權位繼承的合理程序，因而皆有課徵稅收、徵召人力、執行建設工作、並受到人民的擁護。據此而言，一個國家究竟穩定還是脫序的差別，遠比一個國家究竟民主還是獨裁的區別，顯得更加重要而富有意義。這就是說，區分世界各國的最主要的標準，端在於「統治程度」，而非「政府形式」。

「秩序」既是政治系統的首要之務，則急遽增加的政治參與，自然應當盡量避免；S. Huntington 甚至指出，即使號稱唯一近似「發展性的自由模型」的美國，依然也曾不堪負荷過度的參與數量而露出「民主敗象」(democratic distemper)！按照 S. Huntington 的說明，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美國掀起波濤洶湧的「民主浪潮」。在這驚濤駭浪的十年中，「抗議精神、平等精神、剷除不平等的衝動、以及撥亂反正的心態，瀰漫整個大地。六十年代風行的主旋律乃是傑克遜式的民主 (Jacksonian democracy) 與揭發醜聞。」(Huntington, 1975:60) 大體而言，六十年代的美國民眾針對既有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及經濟制度等，進行一系列的廣泛挑戰，既反對權力集中在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又關懷少數民族與婦女的參政權利，更高懸平等原則以痛批那些擁有過多權力與財富之人。這一波波的「民主浪潮」，淋漓盡致地自行表現在各種政治參與行爲中。除了投票活動之外，十年中的選民登記、示威遊行、靜坐抗議、以及組織活動與競選活動的各項指標，皆呈現出上升趨勢。政治參與的快速擴充，不但反映在黑人、印地安人、白人少數民族團體、婦女、學生等日益高漲的自我意識，以及他們日漸增多的議員與州長的當選數目上，而且反映在公、私機構中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辦事人員等確

保本身權益的各項參與努力上。然而，這樣擴展的政治參與程度，一方面促使政府的主要開支，漸從國防與國際政治，轉至社會安全、醫藥健康、保險給付及教育等福利部門，進而造成預算赤字、通貨膨脹及政府債務的高築，另一方面則導致政府權威的式微，從而在政治信任感、政黨認同及政黨一致性等代表信賴權威的各項指標上，皆呈現出下滑趨勢。簡單說，「在六十年代中，美國的民主活力，導致了美國的民主敗象。」(Huntington, 1975:102) 爲了撥亂反正，S. Huntington 主張，美國應該孕育「某些個體與團體」的政治冷漠感，而使他們不會從事政治參與行爲。他說：

Al Smith 曾經評道：「民主痼疾的唯一救藥，就是更多的民主。」但我們的分析指出，目前服用這種救藥，無異於火上加油。相反的，在今日，美國的某些統治問題，乃來自「民主氾濫」……當務之急，則是較大程度的民主節制。在實踐上，這種節制具有兩大應用領域。第一，民主僅是構成權威的一個方式而已，它未必就是一個普遍可應用的方式。就構成權威的方式來說，在許多情況中，專門知識、資歷、閱歷、及特殊才能的要求，可能凌駕民主要求。例如，聘任教師必須徵求學生同意的大學，可能是一所比較民主的大學，但不可能是一所比較好的大學。簡言之，適用民主程序的舞臺，乃是有限的。第二，民主政治系統的有效運行，通常要求某些個體與團體，保持某種程度的冷漠與不介入。過去，在每一民主社會中，都有一些不介入政治的邊緣人口，不論其數目的多寡……然而，社會中的這些邊緣團體，例如黑人團體，現在卻是政治系統中的完全參與者。政治系統的過度負荷的危險性，依然存在。比起歐洲或日本，民主對美國更具威脅性。(Huntington, 1975:113-5)

大幅降低社會中某類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既是六十年代美國「民主敗象」的一帖救藥，那麼是否也是匡濟多數「發展中國家」內政治亂象的一劑良方呢？事實上，S. Huntington 所謂的政治參與程度的提高或降低，根本上蘊含政治參與的變動，大可操控在政治精英的手中，從而隨其政治目標而產

生高低或多寡的變化。這樣的蘊含意義，誠然是別出心裁的「一家之言」。在 S. Huntington 看來，歷來政治參與的經驗研究的最大缺點，就是竟然偏重社會因素與經濟因素，而完全忽視最關鍵的政治因素，因此他一再指出：

在任何社會中，政治精英對於政治參與的態度，可能是影響社會中參與性質之最具決定性的單一因素。

參與策略的選擇，本質上就是精英的抉擇。

在任何時期上的一個社會中，精英的選擇與態度……乃是政治參與最強有力的決定因素。(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28, 36,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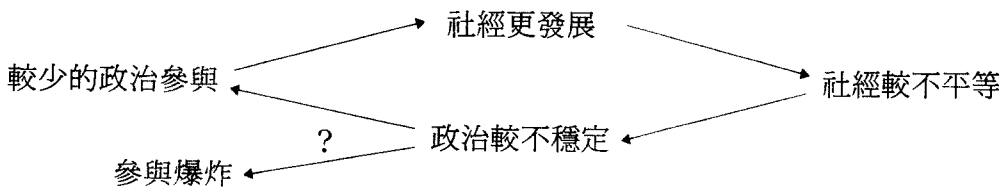
政治參與的變動，既然繫於政治精英的態度，那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對於政治參與的變化，究竟抱持何種態度呢？S. Huntington 指出，在多數「發展中國家」，政治精英雖然時常公開宣揚政治參與的珍貴，但其政策與行動，卻常大異其趣；這主要因為政治參與至多是他們的一種工具性價值，而非一種目的性價值。這就是說，政治精英對於政治參與的態度，基本上受到甲、乙兩種目的性價值的影響：甲，掌權，亦即政治參與程度是否提高或降低，繫於精英能否獲得權力並保持權力的思維上；乙，其他發展目標，亦即政治參與程度是否提高或降低，依賴它到底是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安全、或擴充軍備、或國家整合、或經濟發展、或社會平等、或國際聲望等其他發展目標的手段上。就在朝的政治精英而言，不論他們追求一個或多個目標，政治參與的變化，通常隨著其主要目標而變動。大體上，在朝的政治精英，雖有能力左右政治參與的變動，但往往無意擴大政治參與，甚至時常試圖降低。就在野的政治精英而言，組織並推動各種新、舊團體介入政治，乃是增強政治力量、取代在朝精英的一種手段。因此，他們勢必力圖擴展政治參與，雖然未必具有足夠的推展能力。一旦在朝精英深感威脅時，除了試圖壓制政治參與外，可能也會刻意推動某類參與行為，期能吸引各種團體以對抗在野精英，而使得政治參與快速擴展開來。在朝精英引入新團體以期對抗在野精英的策略，約略計有：透過政黨或結社，組織該團體；推行有益於該團體的政策；創設新參與管道以便將該團體引入政治系統；安插該團體領袖擔任政府

重要職位。當然，在朝精英對於執行重要政府計畫的機構的選擇，例如究竟由中央政府或是由地方機構執行土改計畫的選擇，也會影響政治參與的變動。此外，儘量擴展政治參與，則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政治精英，藉以驅逐異國統治或外國影響的一個手段。總之，在「發展中國家」，政治精英（尤其是在朝的政治精英）的選擇與態度，乃是影響政治參與程度和型式的一個最強而有力的主要因素。

那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如何選擇呢？S. Huntington 指出，這些政治精英的選擇，約可分成四種模型：「資產模型」(bourgeois model)、「專斷模型」(autocratic model)、「工藝模型」(technocratic model)、及「庶民模型」(populist model)。這四種模型雖非窮盡了邏輯上與事實上的可能性，但卻頗能「掌握當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內政治參與及其他發展變項之間的動態變化。」(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21) 依據 S. Huntington 的見解，在當代多數「發展中國家」內，政治參與及其他發展變項之間的關係，會在整個參與演化的不同階段上，發生根本的變動。這些不同的階段，約可區分為二：第一個階段，涉及城市中產階級之政治參與的擴大問題；第二個階段，關涉城鄉低階級之政治參與的擴展課題。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家的經濟活動，開始發展，經濟上的不平等，逐漸拉大，擴展政治參與的社經基礎，也日益強化，整個社會便面臨一個抉擇：「資產模型」與「專斷模型」之間的一個重要選擇。若選取「資產模型」，則優先考慮城市中產階級的政治需求，進而擴展他們的政治參與。在這種發展策略下，城市中產階級至少可以透過選舉制度和代議機關，致力於追求本身的經濟利益，從而促成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但也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等。若選取「專斷模型」，則集中政治權力，壓制城市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並推動社經平等的策略。假使政府當局具有足夠的能力，則可透過官僚系統，強制實施土地改革，一方面爭取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抗拒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以期促成社經平等的目標。在推行土改之後，經濟發展可能導至經濟不平等的趨勢，便告緩和，甚至產生小農地主階級。大體而言，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上，偏好城鄉平等的政治精英，將會選擇「專斷模型」，降低政治參與程度；反之，則會選擇「資產模型」。

就選取「資產模型」的國家而言，日趨懸殊的社經不平等，在一定時期之後，不但限定了中產階級本身的數量增加，而且也會促使低階級起而要求更多的參與機會，並試圖接近權力核心。如此一來，整個社會發展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從而面臨著另外一個抉擇。就選取「專斷模型」的國家而言，被壓制的城市中產階級，過了一定時期之後，雖然可能要求更多的參與機會，但從土改或其他社經平等策略得到實利的低階級，則會十分積極地要求更有效用的政治參與，因而也使整個社會邁入第二個階段，面臨著另外一個抉擇。這個不同於第一個階段上的抉擇，即為：是否擴展低階級的政治參與呢？「工藝模型」顯示出否定答案，「庶民模型」則提供肯定答案。依據「工藝模型」，為了進一步促成經濟發展，必須壓制低階級的政治參與，儘管可能造成更大的社經不平等。然而，貧富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十分可能促成政治參與的再次壓制，有時也會導至「參與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從而摧毀既有政治系統，並徹底改變社經結構。不過，究竟促成參與的再次壓制，還是導至「參與爆炸」，則是一個難以立即判定的問題。簡言之，「工藝模型」可能構成如下的惡性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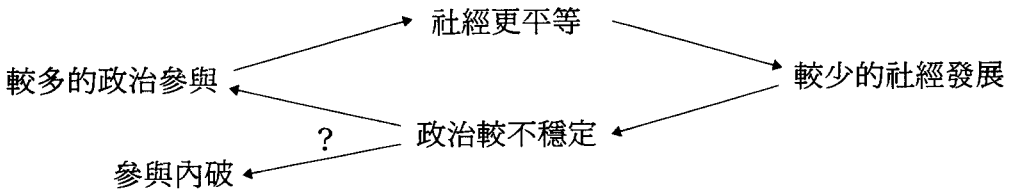


圖二：工藝模型的「惡性循環」

(摘自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9)

按照「庶民模型」，為了力求較大的社經平等，必須擴展低階級的政治參與，並推行福利政策，儘管可能妨礙社經發展。然而，當愈來愈多的團體或個體，力圖分享日見萎縮的經濟成果時，社會衝突便會快速增加，因而造成政治不穩定。這樣的政治不穩定，雖然十分可能促成更多的政治參與，但有時也會導至兩極化的社會，進而引發內戰而摧毀整個社會，或爆發「參與內破」

(participation implosion) 而促成軍人掌權。若軍人持續掌權，則軍事領袖將會運用其他社會力量，壓制政治參與，而使整個社會趨向「工藝模型」。若軍人喪失權力，則整個社會可能重新開始「庶民模型」的另一個循環。簡言之，「庶民模型」可能形成如下的惡性循環：



圖三：庶民模型的「惡性循環」

(摘自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25)

大體而言，在發展的第二階段上，偏好經濟成長的政治精英，將會選擇「工藝模型」，降低政治參與；反之，偏愛社經平等的政治精英，將會選擇「庶民模型」，提高政治參與。

如此說來，上述兩個階段上的四個模型，顯然有別於「發展性的自由模型」。第一，在這四個模型中，政治參與的擴展或縮減，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達成其他目標的手段，即使將它本身看成一種目標，其優先性依然未必高過其他目標。因此，在這四個模型中，政治參與不但是所要解釋的依賴變項，並且是發揮影響作用的獨立變項；政治參與的多寡，可以影響社經發展、社經平等、及政治穩定，反之亦然。然而，在「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中，政治參與僅止於一個只被影響的依賴變項。第二，如果政治參與的擴展或縮減，也是一個目標，那麼，這四個模型均肯定，在各個目標之間，可能含有某種「不相容性」，從而蘊含選擇的難題。例如，政治參與的擴展，在第一個階段上，雖然適合經濟發展，但牴觸社經平等的追求；而在第二個階段上，雖有助於社經平等，卻違背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在朝的政治精英，就常陷入難以抉擇的困境。可是，在「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中，政治參與和其他發展目標之間，沒有絲毫的「不相容性」；所有可欲的目標，皆能被極大化，因而

迴避了選擇難題。第三，在「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中，政治參與的變動，取決於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但在這四個模型中，則隱含一個重要假定：政治參與的變動，主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而在朝精英對於參與及其他發展目標的態度，尤為其中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按照 S. Huntington 的說明，這四個模型與「發展性的自由模型」，均是「理念型」(ideal type)。S. Huntington 雖然未曾指明「理念型」的意義，但從其文章脈絡似可確定，其所謂的「理念型」，不是有關真實世界的純粹描述，也不是某類事物共同具有的通性，而是根據真實世界中的某些經驗成分，加以強調並進行邏輯推理，從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心智建構」。因此，任何一個參與模型，均非真實世界中某一國家的真實寫照；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程度的變動，僅是近似某一參與模型。依據 S. Huntington 的觀點，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與伊朗，接近「專斷模型」；哥倫比亞與一九七三年以後的泰國，近似「資產模型」；六十年代末期的秘魯，漸從「資產模型」轉向「專斷模型」；五、六十年代的巴西，近似「庶民模型」，但一九六四年軍事政變促成「參與內破」，從而轉成「工藝模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智利，接近「工藝模型」，但一九七三年後則近似「庶民模型」；印度、斯里蘭卡、坦桑尼亞、烏拉圭，一度朝向「庶民模型」，而象牙海岸、肯亞、印尼、佛朗哥統治時期的西班牙，則邁向「工藝模型」。

總之，依據 S. Huntington 的見解，在當代多數「發展中國家」，政治參與的擴展或縮減，不論是參與程度、或是參與型式、還是參與基礎，通常都是政治精英達成其目標的一個手段。因此，政治精英的態度與選擇，乃是決定參與變動的最主要因素。這些政治精英的選擇，雖然互有出入，但上述四種參與模型，足以代表其中的抉擇情況，而能掌握政治參與和其他發展目標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引介這些參與模型後，筆者認為下述幾個基本論點，十分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一，S. Huntington 一方面臚列各種難以矯正的缺點，痛批「發展性的自由模型」，另一方面則一再強調「在任何時期上的任何社會中」，政治精英的態度與選擇，乃是影響政治參與的「最具決定性的單一因素」或「最強而有力的決定因素」。兩相對照之下，「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中所設定的各種因

果關係，似乎完全錯誤而令人不屑一顧，另外四種的參與模型，則似乎屬於健全而適用的「心智建構」。依據筆者的淺見，這樣的對照效果，雖屬合理的闡釋或推理，但是實非 S. Huntington 的真正論點。誠如 S. Huntington 所說，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參與變動上，政治精英的選擇，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尤其它具有「瀑布效果」。所謂「瀑布效果」乃指，當政治精英擇定了諸目標的優先順序和所要採行的手段之後，首先便限定了社會團體的選擇系絡，而左右社會團體訴諸政治參與的代價或收益，隨後則界定了各個個體的選擇系絡，而影響個體從事參與行為的可能性。例如，若政治精英選擇了政治參與的擴展，則無異於鼓勵社會團體訴諸政治行動，進而誘導個體介入政治；反之亦然。這種從上而下的連鎖作用，S. Huntington 稱為政治參與的「瀑布效果」(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68)。可是，值得注意的，政治精英的選擇，雖然具有「瀑布效果」，而為「最具決定性的單一因素」，但卻屬短期上的作用，而非長期上的效用。在長期上，「發展性的自由模型」中所設定的各個因果關係，雖然有待商榷，但其中的某些關係，卻得到一再的印證，例如社經發展和自主性參與之間的伴隨關係。那麼，長、短時期的界線，究竟如何劃分呢？依據 S. Huntington 的說明，五年之內，乃屬短期，五年以上，則為長期。總之，於一再精讀之後，筆者認為「在任何時期上的任何社會中」與「最具決定性的單一因素」的說詞，略有誇大之嫌；在 S. Huntington 的見解中，「發展性的自由模型」雖然有所不足，但其中所設定的社會因素與經濟因素，乃是影響「發展中國家」內政治參與變動的長期因素，五年內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則為政治精英的態度與選擇。下文引用 S. Huntington 也曾講過的言論，而來支持本文這一解讀：

從長遠看來，社經現代化產生參與擴大，但過程既非穩定而一致的，亦非不可逆轉的。

自由模型所假定的這些關係，雖然有待商榷，但不必完全拋棄。在長期上，社會的、經濟的、及人口的型態變遷，將改變社會中的政治參與的性質……在任何特定五年時期內所發生的變化，只因政治精英改變他們對於政治參與的態度，或因受到一些抱持不同參與

態度的政治精英的挑戰，或因抱持不同參與態度的在野精英取代了在朝精英。

對於政治參與的長期擴展趨勢，社會因素與經濟因素的機制，顯著提高我們的理解……孕育政治參與之擴展的經濟力量 and 社會力量，似是全球性的、長期上不能改變的。然而，短期上參與程度的突然波動，通常就是精英行動的直接結果。(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 27, 28, 170-1)

事實上，本文這一解讀的正確性，可從 S. Huntington 對於政治參與是否作為一個目標、或一種手段、或一種副產品的獨特分析，得到進一步的驗證。依據他的獨特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的擴展，在設想上，可以是甲、乙、丙三種情況的結果。甲情況乃指，政治參與的擴展，就是政治精英、社會團體、及一般公民的首要目標；乙情況是指，政治參與的擴展，本是政治精英、社會團體、及一般公民用來達成目標的一個手段；丙情況則指，政治參與的擴展，原是政治精英、社會團體、及一般公民達成目標的一種副產品，基本上也就是社經發展的結果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60-8)。然而，在實際上，甲情況絕少發生，乙與丙則屬常見情況。值得注意的，發生丙情況的可能性，遠大於乙情況。S. Huntington 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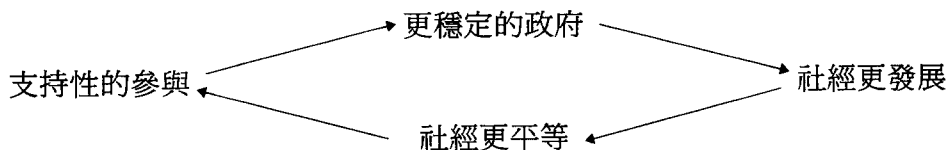
政治參與的擴大，較多是社經現代化的副產品，較少是個體、團體、或精英等有意識的首要選擇。

一般而言，政治參與本身不可能被當作一個所要追求的目標；有些時候，它被作為一個達成其他目標的手段；但它最可能的呈現方式，乃是形諸一種達成其他目標的副產品。

比起精英、團體、或個體將它視作目標或手段之有意選擇的後果來，政治參與的程度、型式、及基礎等的變動，更可能是發展的副產品或無意圖的後果。(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vii, 41, 166)

第二，依據 S. Huntington 的見解，「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在發展

的第二個階段上，面臨兩條背道分馳的發展路徑：不是「工藝模型」就是「庶民模型」。爲了經濟發展，政治精英將會選擇「工藝模型」，壓制低階級的政治參與，從而拉大經濟不平等；爲了促進社經平等，政治精英將會選擇「庶民模型」，容許更多的政治參與，並推行所得再分配的政策。這兩種對立的參與模型，本質上蘊含社經平等、社經發展、及民主的政治參與等三個發展項目，不可能同時推進，或不可能兼容並蓄。然而，I. Kabashima 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雖然正處於 S. Huntington 所謂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上，可是它的發展路徑，非但沒有沿著「工藝模型」或「庶民模型」，反而順著一條兼容社經發展、社經平等、及民主的政治參與等三個項目的通路大道。按照 I. Kabashima 的說明，促成這三個項目的相輔相成，端在於日本農民的支持性參與。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政治穩定的先決條件下，高儲蓄率、高勞力品質、及技術轉型等因素，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自民黨的長期在朝，提供了經濟成長的先決條件。一九五五年民主黨與自由黨合併成自民黨後，自民黨就完全掌控著日本政府。在維持自民黨的這種優勢上，農民與經濟精英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約有百分之七十一的農民及百分之七十五的經理與行政主管，一直支持著自民黨並經常從事政治參與，從而使得決策者十分重視他們的需求。爲了回報農民，除了透過預算系統嘉惠農民之外，仍然繼續保留其國會議員名額的原先分配與下院選區的劃分，儘管農村人口已經外移而大幅減少；爲了回饋經濟精英，政府大力推動工業發展。經濟愈發展，嘉惠農民的津貼愈容易籌措，支持性的政治參與也就愈強。I. Kabashima 指出，這些複雜的各種關係，大體上構成下述的「支持性的參與模型」(model of supportive participation)：



圖四：支持性的參與模型

(摘自 Kabashima, 1984:336)

按照這個模型，（農民的）支持性參與愈強，政府愈穩定；政府愈穩定，社經愈發展；社經愈發展，（透過所得再分配的政策）社經就愈平等；社經愈平等，支持性參與就愈強。總之，在第二個發展階段上，日本農民（低階級）的高度政治參與，未如 S. Huntington 所說削弱了經濟成長的力道！面對這個「異例」，S. Huntington (1987:21) 答說：「日本或許是個特例；在日本之外，低階級的參與、快速成長、及經濟平等，能夠相容契合嗎？」誠然，這是十分值得探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或許，土地改革成功的台灣，可能是另外一個「異例」。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確知，在 S. Huntington 所謂的第二個發展階段上，除了難以抉擇的兩種參與模型外，尚有一個 S. Huntington 或能接受的、近似「發展性的自由模型」的「支持性的參與模型」。事實上，S. Huntington 對於四種參與模型的陳述，確有幾個尚待加強之處：(1)「資產模型」與「專斷模型」的披陳，僅止於少數幾段的文字概述，而乏「模型」的圖示，因而不易精確掌握其中的因果流向；(2) S. Huntington 雖然一再力主「政治精英的選擇與態度」的關鍵作用，但在圖示的「工藝模型」與「庶民模型」中，竟然毫無設定而不見蹤跡；這如何在實際的經驗資料中，按照所示模型，檢證此一關鍵因素的重要作用呢？(3) S. Huntington 曾經別出心裁，分就目標、手段及副產品三者，縱論四種參與模型中政治參與程度的多寡變動，但依本文第二節的解析，其所謂的政治參與，既包含合法行為又包括非法行為，因而使得著名的獨到見解，易於淪為他自己所說的泛泛之論：「只在最籠統的意義上，我們才能說及某一社會中政治參與程度的整體增加」(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4)。依據本文第二節的分析，對於合法和非法的參與行為，我們實應分開處理，何況非法的參與行為，難以說是在朝精英的目標或手段。

第三，在政治研究的領域上，「價值中立」的原則，乃是一個極受重視，並曾引起長期爭論的根本課題。七十年代以後，一些力主「價值中立」的著名政治學家，多多少少都曾公開地略作澄清或稍作修正（參見郭秋永, 1998b; Zolo, 1995），但 S. Huntington 至今依然故我，絲毫未見白紙黑字的更改或釐清。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已主張政治學者不必研究「應然問題」，也不該設定任何一個價值立場。他說：「對於人們應該如何行動的探討，不是政治行

為研究的關切所在……在不設定一個價值立場之下，社會科學家有系統地研究公民參與的增減。」(Huntington, et al., 1952:1004, 1015) 在一九七六年的著作中，S. Huntington 仍然強調其研究旨趣，不在於熱心的「應然推薦」，而在於冷靜的「實然分析」。例如，他說：「此處的要點，不在推薦其中一條路線，也不在建議任何社會追求其中一個管道（流動或組織管道）而完全排斥另一管道，說明白些，乃在於強調政治參與本身的擴展，密切關連著一些常被視為可欲的其他價值，並釐清個體、團體、及政府對於這些價值所做的選擇。」(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103) 在一九九一年的著作中，他再次宣揚「價值中立」的原則，甚至「量化地」表白其堅持的強度。他說：「我試圖保持我的分析，盡可能脫離於我的價值；至少，這本書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是如此進行……在本書中有五處，我放棄社會科學家的角色，而擔當政治顧問的角色，提出數套『民主人士的行動指南』。」(Huntington, 1991: xv) 此處熱心推薦的「行動指南」，乃指 S. Huntington 樂意充當「政治顧問」，而特為三種民主化過程中的民主人士，分別策畫的各種行動要領，甚至包含「針對保守派採取無情的嚴厲手段，孤立並抹黑那些極端反對改革的份子」之類的狠招 (Huntington, 1991:141)。這些林林總總的行動要領，雖然多達四十五個項目 (Huntington, 1991:141-2, 149-50, 162-3, 231, 251-3)，但 P. Schmitter (1993:351) 認為可以濃縮成一句格言：遠離暴力、邁向核心、並準備妥協。可是，如何算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九十五的數值呢？自認為社會科學家的 S. Huntington，竟然毫無隻字片語。若按頁數計算，則「民主人士的行動指南」的篇幅，約計十一頁，至多只佔全書正文（三百一十六頁）的百分之三；顯然小於所說的百分之五。或許，百分之九十五的數值，只不過強調一種信誓旦旦的不變立場罷了。然而，這個不變立場，暗中略有更動。大體而言，政治學家所謂的「價值中立」，至少包含四個基本論點（參見郭秋永，1988:200-377; Sartori, 1987:4-6）。按照筆者的檢視，S. Huntington 歷年來一再宣稱的，則是其中兩個論點：(1)價值語句的真偽證明，完全超出科學研究範圍之外，因此政治科學研究不必探討「應然問題」；(2)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政治學者不可引入價值判斷，而在研究報告中，也需排除價值語句或推薦陳述。五十年代以降，S. Huntington 一直固持前一論點，但後一論點則

稍有更動：從完全不設定任何價值立場，到公開包含少量的價值語句或推薦陳述。在《第三波》一書的序言中，他明白指出：

在先前出版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我的分析重點，端在於政治穩定的問題。我撰寫那本書，因為我認為政治秩序乃是一件好事……現在，本書的解析焦點，集中在民主化。我寫本書，因為我相信民主政治是好的。(Huntington, 1991:xv)

誠然，就 S. Huntington 來說，這一種細微更動，非但無關緊要，反而更能彰顯他本人信守「價值中立」的堅定立場。因為光明磊落地披露出基本的價值判斷，似乎正可完全杜絕「暗中夾帶」特定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按照筆者淺見，抱持某一價值判斷的坦承，並不等於就已阻絕了該價值判斷的有意或無意地「滲入」研究報告中。何況，一旦懷抱某一價值前提，則該價值與所要蒐集的事實之間，往往構成從上而下的連鎖限定關係，而形成通常所謂的「負載價值的事實」或「負載理論的事實」(value-laden fact or theory-laden fact) (參見郭秋永, 1998a)。因此，在坦承「政治秩序乃是一件好事」的價值前提下，S. Huntington 很容易蒐得經驗資料，從而推出高度政治參與造成「民主超載」並導致「民主敗象」的結論。P. Bachrach and A. Botwinick (1992:44-6) 則在「民主政治乃是一件好事」的不同價值前提下，分就美國歷史、政府的反應對象、所應課稅的成員等事實根據，論證「民主超載說」的不當，進而導致「需要更多民主」的結語。進一步說，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的首頁，S. Huntington 曾經寫下一個名句（「世界各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別，不在於政府形式，而在於統治程度」），從而意指「一個國家究竟穩定還是脫序的差別，遠比一個國家究竟民主還是獨裁的區別，顯得更加重要而富有意義」，進而指出「民主敗象」的困境。十九年後，在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就職演說中，S. Huntington (1988) 斷定，「民主政治和政治學一同發展」或「政治學只隨著政治參與的擴展而發展」。在一九九一年問世的《第三波》一書中，S. Huntington 雖然洋洋自得地再次引用《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首頁中的「名句」，但卻依據民主政治

密切關連著個人自由、政治穩定與民主政治的緊密關係、擴展民主政治有助於國際和平、及有益於美國未來等四個理由，強調民主與獨裁之別的重要性，並高唱「民主政治是好的」(Huntington, 1991:xv, 28-30)。顯而易見的，從「政治秩序」遠比「民主政治」更為重要的判斷、轉為「政治學和民主政治一同發展」的見解、再轉成「民主政治是好的」的立場，乃是相當重大的一個轉變。然而，在這樣的巨變上，S. Huntington 並未提供改弦易轍的論證，難怪 B. Barber (1992:87) 將其「秩序偏好」，斥為「偽裝中立的反民主的政治學」，而把他的「民主偏愛」評為「搖擺不定的、偽君子的證詞」。

五、結語

著名政治科學家 S. Huntington，素以「學術淵博，著作等身」著稱；舉凡國防、外交、革命、文武關係、政治參與、政治變遷、政治制度、民主化、文明衝突等等論題，均有全盤性的爬梳工夫，更有獨到的見解。其中有關文明衝突的論著尤其掀起十分熱烈的討論風潮，甚至招致正、反兩面極為懸殊的評價（參見 Schulman, 1998; Senghaas, 1998; Booth, 1997; Gershman, 1997; Gress, 1997; Walt, 1997; Hassner, 1996/ 1997）。

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的研究領域上，S. Huntington 的一系列著作，雖然未曾引起十分廣泛的迴響，但卻蘊藏著一些甚為重要的方法論課題。誠然，S. Huntington 的立論基礎及其提出的各種參與模型，雖有尚待改進之處，但在在展現出一些獨排眾議的新穎洞見，而值得學界的深入探究。基於此一見解，筆者不揣譴陋，提出進一步的剖析，從而得到下述幾個重要論點：

第一，就西方政治理論史上政治參與的演化趨勢而言，長久以來的兩種不同「政治見解」，各自蘊含著互有出入的參與觀念；「交互性行動」的參與觀念，著重一般公民「相互之間」的教育作用，「工具性行動」的參與觀念，強調「由下而上」的影響作用。S. Huntington 的政治參與的界說及其闡釋，則在「工具性行動」的參與觀念中，添增「由上而下」的影響作用；亦即將「一般公民影響政府人事或決策的行為」中的「影響」意義，從「由下而上」的單向含意，轉成「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雙向含意。這種轉折與添

增，不但使得研究者能夠排除知識上的固有障礙，而且開拓了嶄新的研究領域；其中蘊含的深遠意義，不言而喻。

第二，在建立政治參與的綜合指標上，S. Huntington 的主張，雖然擲地有聲，但顯然陷入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中：他一方面認為六個參與型式「同具特定性質」，而足以共同隸屬於「政治參與」這個總稱之下，因而大可論及某一國家的「整體參與」，另一方面卻斷定研究者不能將六個參與型式各自測得的各個數值，加總成爲一個代表「整體參與」的綜合指標，因而只許個別討論某一參與型式的程度，至多「在最籠統的意義」上才能泛談整體參與程度的變化。依據筆者的淺見，六個參與型式的數值變化，是否源自相似的原因、是否呈現出相同的變化、是否促成相近的結果，誠屬建立綜合指標的考慮基準，但「同具特定性質」也是一個值得斟酌的標準。換而言之，爲了解決 S. Huntington 的困境，筆者認爲下述權宜辦法，也許不失爲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法：暫時先將暴力參與型式另作處理、或者先行區分「慣常性」和「非慣常性」兩類參與行爲、或者先行區別「合法性」和「非法性」兩類參與行爲，然後再依 S. Verba 等學者的建構方式，進行參與型式的印證和綜合指標的建立。

第三，在自主性參與和動員性參與的分辨上，S. Huntington 的解析，固然振振有詞，但也引出政治研究領域中一個尙待努力的根本課題：政治學者對於區分「光譜式性質的概念」（例如「自主性」）的理解能力，遠落後於我們對於該區分的建構能力。

第四，在當代「發展中國家」內，政治參與的數量或型式的變動，可能受到無數因素的影響；這些普遍的或特殊的無數因素，固然具有複雜而難以釐清的相互關係，但可分就長期性和短期性的變化，而來掌握其中的精要。就長期的緩慢波動而言，社經因素足以造成政治參與的「擴展壓力」，從而使得政治參與的穩定擴展，成爲社經發展的副產品。就短期的劇烈變動而言，政治精英的態度與選擇，乃是左右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

第五，S. Huntington 對於四種參與模型的陳述，確有幾個尙待加強之處：(1)「資產模型」與「專斷模型」的披陳，僅止於少數幾段的文字概述，而乏「模型」的圖示，因而不易精確掌握其中的因果流向；(2)雖然一再力主

「政治精英的選擇與態度」的關鍵作用，但在圖示的「工藝模型」與「庶民模型」中，竟然毫無設定而不見蹤跡；這如何在實際的經驗資料中，按照所示模型，檢證此一關鍵因素的重要作用呢？

第六，從「政治秩序」遠比「民主政治」更為重要的判斷、轉為「政治學和民主政治一同發展」的見解、再轉成「民主政治是好的」的立場，乃是相當重大的一個轉變，但 S. Huntington 並未提供改弦易轍的論證，從而使得一向堅持的「價值中立原則」，顯得搖擺不定。

參考資料

郭秋永

- 1985 〈評「韓國的政治參與：理論模型的應用問題」〉，《中山社會科學譯粹》，第一卷第一期，頁 81—84。高雄：中山大學。
- 1988 《政治學方法論研究專集》。台北：商務印書館。
- 1993 《政治參與》。台北：幼獅出版社。
- 1998a 〈社群權力的多元模型：方法論上的探討〉，蕭高彥與蘇文流主編，《多元主義》，頁 195-235。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
- 1998b 〈政治參與和多元政治：理論建構上的價值問題〉，《行政學報》，第二十九期，頁 1—60。台北：中興大學。
- 1999 〈強勢民主：新時代的政治參與〉，《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八卷，第六期，頁 63-94。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Bachrach, P. and A. Botwinick

- 1992 *Power and Empowerment: A Radical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Barber, B.

-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An Aristocracy of Everyone: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dix, R.

- 1971 "Comment 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pp.168-70.

Bienen, H.

- 1974 *Kenya: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and Control*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irch, A.H.

- 1993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Y.: Routledge).

Booth, K.

- 1997 "Huntington's Homespun Grandeur,"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68:425-428.

Cammack, P.

- 1997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Third World: The Doctrine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Conway, M.

- 199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second edition).

Dahl, A. R.

-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ershman, C.

1997 "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4):165-170.

Gress, D.

1997 "The Subtext of Huntington's 'Clash'," *Orbis*, vol. 41:285-99.

Hassner, P.

1996/97 "Morally Objectionable, Politically Dangerous,"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pp.63-69.

Huntington, S.

1965a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386-430.

1965b "Communication on Almond's Book Review of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65, vol. 59:446-447.

1966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merica vs.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 18:378-414.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S. Huntington & C.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3-47.

1971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83-322.

1975 "The United States," S. Huntington, M. Crozier, and J.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9(2):193-218

1987 "The Goods of Development," in M. Weiner and S.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pp. 3-32.

1988 "One Soul at a Tim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Re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1):1-10.

1989 "The Modest Meaning of Democracy," R. Pastor, Eds.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p.11-28.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a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b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6):28-46.

1997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4):3-12.

Huntington, S. et al.

1952 "Research in Political Behavi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4):1003-1045.

Huntington, S. and C. Moore

1970 "Conclusion: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One-Party Politics," in S.

- Huntington & C.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509-517.
- Huntington, S. and J. Dominguez
 1975 "Political Development." F. Greenstein and 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Macropolitical Theory (MA: Addison-Wesley) pp.1-114.
- Huntington, S. and J. M. Nelson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M. Crozier, and J. Watanuki
 1975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Isaak, A. C.
 1985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Inquiry*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 Kabashima, I.
 1984 "Supportive Participa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Japan," *World Politics*, vol. 36(3):309-38. (April 1984)
- Kim, Chong Lim
 1980 "The Pattern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Chong Lim Kim, 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Korea: Democracy, Mobilization and Stability* (California: Clio Books, 1980), pp.1-20.
- Kramer, G.H.
 1986 "Political Science as Science" in H. Weisburg,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Y.: Agathon Press, 1986), pp.11-23.
- LaPalombara, J.
 197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 Verba and R. Pye, Eds. *The Citizen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n. Greylock), pp.167-194.
- Nelson, J. M.
 198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 Weiner and S.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pp.103-159.
- Nie, N. H. and S. Verba
 197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 Greenstein and 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ngovernment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p.1-74.
- Randall, V. and R. Theoball
 1998 *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ird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second edition)
- Sartori, G.
 1984 "Foreword" in G. Sartori, ed.,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pp.9-11.
-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New Jerse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 Scaff, L.
- 1975 *Participation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A Stud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Schmitter, P.
- 1993 "Comment on *The Third Wav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5:348-351.
- Schulman, S.
- 1998 "Comments 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1):304-6.
- Senghaas, D.
- 1998 "A Clash of Civilization — An Idee Fix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5(1):127-132.
- Verba, S. and N. H. Nie
-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Social Equalit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Verba, S., Bashiruddin Ahmed, and Anil Bhatt
- 1971 *Caste, Race,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Inc.)
- Verba, S., N. H. Nie, and Joe-on Kim
-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t, S.
- 1997 "Building up New Bogeymen," *Foreign Policy*, no.106, pp.176-189.
- Weiner, M.
- 196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ed.,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pp. 223-235.
- 197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ri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Leonard Binder, J. Coleman, J. Lapalombara, L. Pye, S. Verba, and Weiner, Eds., *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59-204.
- Zolo, D.
- 1995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K. Gavroglu et al. (eds.), *Science, Politics and Social Practice*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247-26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S. Huntington's Theory

Chiu-yeoung Kuo

ABSTRACT

The processes by which electoral and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pread in the Wester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have fascinated political scientists for a century and a half. Until the mid-1960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have attracted the interests of political scientists. 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evolution, however, has been in the progressive — though still incomplete and contested — shift in our basic conception of participation from an older to a newer image. The pioneer works by Samuel P. Huntingt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 a major stimulant to the image shift. The inconsistencies of the two images may still be influencing our research design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valuate the fundamental thesis of Samuel P. Huntington's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alternative model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to clarify some of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generated by the image shift.

Key Words: political theory, democratic theor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methodology